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印尼自認係東協大國，其與中共發展關係可追溯至 1950 年 6 月正式建交開始，起初的 15 年兩國關係呈現穩定的發展，嗣因美國的宣傳，以及台灣國民黨勢力在印尼的影響，使得印尼對中共領導的中國政府產生了恐懼和疑慮；之後印尼發生國內政治鬥爭的「930 事件」¹，中共和印尼關係隨之凍結。²加上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朝冷戰發展，民主美國領導的自由國家集團，對抗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集團，形成兩極化世界；另外亞非的開發中國家雖然也以不結盟為號召進行聯合，但印尼及其所屬的東協國家則成為東西兩大陣營拉攏的目標，尤其是美國以自由貿易與民主為名，積極將其影響力伸入東南亞地區，迄今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東協主要國家仍深受美國的影響。因此，冷戰結束後，近年來中國快速崛起，美國在亞洲的勢力也隨之稍顯退卻，東協國家的區域力量則更加受到重視，中共當然會積極介入東南亞事務，展現其大國力量；印尼在 2000 年後政局更趨民主，基於國家利益之考量，勢將會改變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加強兩國關係，除凸顯印尼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意願外，也希望傳達出印尼在東協組織內佔有重要地位的訊息。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的開放與快速發展，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的成就，間接壓縮其他世界經濟大國或區域經濟體的經貿活動空間，例如美國、日本，以及歐盟等，並使國際間出現所謂的「中國威脅論」³；中共為消弭國際間對其發展的反感，曾在「十六大」中宣布將以「大國外交」作為其發展對外關係的主軸。基此，中共為展現一個區域大國，也會開拓與鄰近國家的外交關係，故其與印尼外交關係的發展

¹ 依據印尼官方說法，930 事件係印尼政府粉碎一項顛覆國家的軍事政變行動，時任陸軍司令的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因此掌握軍權，並維護首都雅加達的安全，當時之總統蘇卡諾（Sukarno）隨後同意將政權轉移給蘇哈托，開啓了「新秩序時代」，印尼也轉向反共立場，在國內進行肅共與排華運動，並凍結與中共外交關係；但迄今仍有認為該事件為「政變」或是「反政變」之兩種說法。

²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民國 88 年），頁 388~392。

³ 持中國威脅論者認為：中共的經濟發展會導致其軍事實力的增強，會對周邊國家及亞洲甚至全球的局勢穩定與安全構成威脅，不願意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參閱陸鋼、郭學堂合著，《中國威脅誰：解讀中國威脅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125。

實乃係中共睦鄰外交的一環；而印尼近年民主改革後，亦希望躋身於區域重要國家之林，首先也要與中共改善關係，甚至更進一步地藉由與中共發展友好關係，協助印尼成爲在區域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因此，印尼與中共現階段的關係，尤其是兩國的合作與衝突，也值得同是此區域國家之一的台灣學者作進一步的研究，以作爲台灣在發展兩岸關係和對東南亞國家關係時的重要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全球化縮短了國與國的距離，國際間的交流，包括國際貿易、政府合作、軍事交流、人民往來等等，更趨密切，相互影響也愈來愈深遠；故 21 世紀的全球化快速發展，因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進步，天涯若毗鄰之感日益突顯瞭解國際關係、世界民族與宗教、區域整合等議題，對國家擬定外交政策具有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國際關係發展的研究，對各國在推動與策定上述領域之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台灣在面臨中國崛起，歐、美、日等世界強權對中國的發展均投以高度關注與期待之際，爲開拓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以及追求未來的生存發展，必須對中共對外關係進行瞭解與研究以謀對策。

而印尼是東協的大國之一，其領土遼闊，人口眾多，被國際視爲未來極具發展潛力的國家，加上印尼係包含多元民族之國家，其政治文化對該國外交政策也會呈現不同的思維方式；尤其華人在印尼經濟領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且華人亦在中共與印尼關係發展中扮演特殊角色。以上即是本篇欲藉印尼近年來改善與中共外交關係，作一初步綜合性研究，目的在提供相關工作者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理論

作爲一項社會科學的研究，其理論依據乃在顯示此研究能否符合期望或是有意義的重要憑藉；因此，要研究國際關係必須要具備理論素養，學者可根據理論來推估國際關係的可能發展。⁴一般學者認爲，自從 1648 年歐洲各國在「卅年戰爭」後

⁴ Joshua S. Goldstein &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th Edition," Quebecor: Word Taunton, 2006, p. 6.

簽定西發里亞條約 (The Treaty of Westphalia)，歐洲地區的民族主義開始日益高漲，使得歐洲各國紛紛朝向擺脫封建制度的束縛發展，於是民族國家逐漸出現，並成爲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構成單位。⁵自此以後便有學者開始對所謂國與國之間互動形成的國際關係進行學理探討，以分析此一新的國際關係發展現況；但因國際事件的發生常無從預測，也使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難以作一定論。由於並不存在一個強而有力的理論，能夠解釋所有的國際關係發展；因此爲符合本篇研究之需，謹試以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 作爲探討印尼與中共關係演變之參考。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背景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主要是觀察國與國之間權力的作用，其中尤以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具體指出現實主義的原則 (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Realism)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之研究最具影響力；⁶其要點爲：第一、國際政治是遵循著人性的客觀法則；第二、國家的決策者其思想與行爲皆是爲了該國之利益；第三、國家利益是基於客觀的因素做考量，求生存則係外交政策的最基礎之要求；第四、一國在維護其國家利益時所採行之策略行爲，不受國際道德原則之限制；第五、國家的特殊道德標準與世界的道德法則不能相提並論；第六、政治行爲應以政治的標準來作評斷。⁷據此，部分現實主義學者將相關的理論歸納成三項法則：首先是國家爲國際體系最重要的成員；其次爲國家會理性地追求國家利益；以及國際體系是屬於無政府的狀態。⁸

現實主義主要是探討國際體系裡國與國的關係，而在政治學的一般性理論中，伊斯頓 (David Easton) 的系統論則是以政治系統的結構及其運作過程來描述或解釋政治現象，其對政治學也具有相當深遠之影響；而且也有學者認爲「政治系統」的概念似乎已經取代了「國家」，並成爲研究的核心概念。⁹若將系統理論擴大至國

⁵ Joshua S. Goldstein &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th Edition," Quebecor: Word Taunton, 2006, p. 31.

⁶ 李國威，《國際關係新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8 年 4 月)，頁 12。

⁷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48, p.40. (轉引自李國威，《國際關係新論》)

⁸ Goldstein & Pevehouse, *op. cit.*, pp. 56~57.

⁹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4 年)，頁 36~37。

際體系中，其主要是強調處於外部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裡，國際政治體系內部各國或是國際組織因輸入項的運作，將會產生相關連的輸出項。而該最後的輸出項結果也會再藉由「反饋」的過程，進一步地去影響下一個新的輸入項因素；如此週而復始的循環，使整個系統會以追求一個均衡的狀態作為其運轉之目的。

在國際間的權力平衡系統中，國際體系是處在一個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稱的無政府狀態；¹⁰一國或是多國若想要去反制其他國家行使權力，其最有效的方法即是結合該等國家的力量，共同去抗衡另一國或是國家集團，此種國際體系狀態被稱之為「權力平衡」。¹¹權力平衡論（balance of power）屬於國際關係研究學派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其主要內容是針對理想主義學派（Idealist）中只探討國際關係的法律與國際道德準則，而忽視國際關係運作中實際產生的影響力，亦即是所謂爭權奪利的政治行為之缺失，而逐漸演變形成的理論。¹²冷戰期間的民主國家集團對抗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即是最為顯著的國際權力平衡體系的範例，當時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便是依據其所處的國家集團，以及外在的國際環境變化，以策定對其最有利的外交政策。

但在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因國際環境的變化，世界原來的二極體系隨前蘇聯的瓦解而崩潰，新的國際秩序仍在成形當中；由於現實主義學派無法對快速變化的國際關係即時提出充分之解釋，故有學者著手進行調整，而出現了強調國際權力鬥爭，和主張國際社會仍有合作空間的現實主義間之爭論。其中也有重新將古典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主張納入，調和形成中間派，且是較為周全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嗣後新古典現實主義在 19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期間開始日益受到關注。¹³

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內涵

¹⁰ 郭承天，《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 85 年），頁 1。

¹¹ Joshua S. Goldstein &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th Edition," Quebecor: Word Taunton, 2006, pp. 76~77.

¹² 李國威，《國際關係新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77 年），頁 9~11。

¹³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民國 94 年 1 月），頁 115~123。

現實主義者因為過分重視權力，而忽略了國際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合作聯盟體就是歐盟，現在的歐盟係源自於 1957 年的羅馬條約，首先成立煤鋼聯營機制，再發展成共同市場，最後在 1992 年簽訂馬斯垂克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 建立歐盟。¹⁴在亞洲則有東協，東協的成立可追溯到 1955 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嗣後於 1961 年 7 月由菲、馬、泰三國組成經濟合作組織「東南亞聯盟」，1967 年 8 月再加上印尼與新加坡共五國外長在曼谷發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東南亞國家聯盟宣言)，成立「東協組織」¹⁵。以上是在冷戰時代，現實主義盛行時的國際合作領域中，較佳的明顯範例。

由於現實主義仍具有古典現實主義所包含的霸權爭逐和權力消長的論述，故為能夠更有效地解釋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現象，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從維護現實主義出發，並納入了古典現實主義的內涵。其在層次分析上，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仍是影響國家對外行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並且也包括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成分；而在本體論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能力包含了有形和無形的資源。大體而言，在國際體系層面係以物質因素作為分析的依據；在國內的決策者方面，則主要依賴理念因素。¹⁶

新古典現實主義是為補充新現實主義及維護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中的主流地位，由一些學者在 1990 年代左右，先後提出前述的主張與研究方法，經由 Gideon Rose 根據多位現實主義者的論述，對「新古典現實主義」提出對國際關係研究之功能：包括如何對實際的權力關係進行瞭解；如何運用不同的權力來源做出決策；權力關係改變所產生之影響；引起權力關係改變之因素；以及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決策之特徵。¹⁷但因新古典現實主義在新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之間，採取折衷的做法，似乎顯現不出新理論的特殊性，甚至被質疑可否具備理論的條件；¹⁸惟反面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是為因應難以掌握的新國際環境發展，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的

¹⁴ Joshua S. Goldstein &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th Edition," Quebecor World Taunton, 2006, pp. 381~387.

¹⁵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民國 86 年），頁 4。

¹⁶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民國 94 年 1 月），頁 124~125。

¹⁷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se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October 1998), pp. 144~172. <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olau/ir/archive/ros1.pdf>

¹⁸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民國 94 年 1 月），頁 124。

重要理論，目的是希望藉由較為彈性的理論來描述，期對國際事件能作出較為合理之解釋。因此，似仍具有參考與應用價值。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我國學者對中共外交政策之研究者眾，著作篇數亦多，由於兩岸民族文化關係密切，且擁有相同的歷史淵源，故對於中共現況之研究甚具深度，應可視為重要參考資料；惟有關鑽研中共與印尼關係演進之論述則較為有限，僅能從有關東南亞區域研究中，擷取部分之內容以供參考，故此一領域實有再進一步研究之空間。此外，審閱國外尤其是美國與印尼當地學者對中共與印尼關係發展研究之相關論述，從中分析並驗證假設之可能性，亦可作為本篇研究之重要內容。

一、印尼對中共政策由疑懼轉為戰略夥伴

印尼前總統哈比比（Habibie）在雅加達籌設的研究機構「哈比比中心」（Habibie Centre）資深研究員伊曼（Irman G. Lanti）認為，印尼自 1998 年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下台後，印尼已失去作為區域最具影響力的大國，甚至到 2005 年印尼政府仍忙於國內事務而忽略外交；但 2005 年 4 月間在雅加達及萬隆（Bandung）舉行的「亞非會議 50 週年紀念」（50th Commemoration of the Asian African Conference），期間印尼總統蘇希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協議，此標誌著印尼改變過去視中共為潛在威脅之態度，轉為與中共加強合作關係，以及印尼政府的外交政策朝向獨立於西方的外交思維。¹⁹

印尼的經濟學者哈迪（Hadi Soesastro）就經濟角度，分析印尼與中共關係的演變，其中印尼在 1980 年以前與中共雙方沒有直接的貿易，商業往來大多數是透過香港與新加坡的轉口貿易；1990 年印尼和中共復交後，雙邊貿易額由 1980 年的 5 億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75 億美元，以及到了 2002 年梅嘉娃蒂（Megawati Soekarno

¹⁹ Irman G. Lanti, "Indonesia Accomplishment Amidst Challenges," *Southeast Asia Affairs* 2006, Singapore: ISEAS 2006, pp. 102~103.

Putri) 總統訪問中共，當年雙邊貿易額已達 100 億美元。由於彼此經貿關係的顯著提昇，哈迪認為雙邊的經濟關係是深受兩國加強外交的影響。因為印尼自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迄今經濟復甦速度緩慢，故印尼國內學者在研究與分析印尼的對外關係發展上，多會首先考量經濟因素，或是如何才會對印尼未來經濟發展有利；²⁰因此，以印尼和中共復交後的經貿關係發展觀之，印尼為擴大對中共貿易，或是爭取中共的經濟奧援，均是目前印尼改變對中共政策之重要理由。

中共學者劉宏烜以研究歷史角度分析中共和印尼關係，認為華人與印尼人接觸可追溯自漢朝開始，迄今已有兩千年，故雙方關係發展具有悠久歷史；而近代自印尼獨立後，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即為 1955 年召開的「萬隆會議」，該會議標榜促進亞非各國合作和睦鄰關係。之後雖然印尼與中共斷交，但 1990 年兩國復交後，雙方領導人的互訪則又再次開啓兩國新時期的合作關係。²¹中共前外交部政研室主任裴遠穎於 2005 年 11 月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出版之《國際問題研究》中，以〈中國外交戰略與和平發展〉發表專論，認為對中共而言，營造和平共榮的周邊環境，將有助於未來中共國內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因此，中共基於「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基本政策，除了持續上海合作組織、參與六方會談維護韓半島和平外，加強與東協國家關係，也是基於中共國家利益考量，所採取的外交戰略之一。²²

台灣學者認為，由於冷戰初期中共因採取一面倒向蘇聯對抗美國政策，故在 1965 年以前曾支持印尼蘇卡諾總統 (Sukarno) 反帝與反殖民地鬥爭，並支持印尼對抗馬來西亞，以及印尼退出聯合國行動，嗣後才因「930 事件」，印尼政府指責中共介入該事件，以及中共公開支持印尼共產黨反對軍人政權，而導致雙方在 1967 年外交關係中斷。但印尼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採取現實主義外交作法，改以戰略利益及經濟利益優於意識形態，逐漸在 1980 年代後期朝向改善與中共關係方向

²⁰ Hadi Soesastro, "Hubungan Indonesia-Cina Mana Dagingnya?" *KOMPAS*, Jakarta: 1 April 2002.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kompas-cetak/0204/01/UTAMA/huba01.htm>

²¹ 劉宏烜,《中國睦鄰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頁399~408。

²² 裴遠穎,〈中國外交戰略與和平發展〉,《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1期(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頁7。

發展。²³到了 1990 年 8 月印尼與中共正式恢復了外交關係，中共前總理李鵬並在同一年訪問印尼，印尼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也在當年回訪大陸；之後雙方國家領導人互訪頻繁，1991 年及 1993 年楊尚昆主席及人大委員長喬石亦分別訪問印尼。²⁴由此觀之，印尼與中共兩國關係發展，過去實受到國際冷戰兩極化格局之影響；而近年來國際全球化發展趨勢增強，加上中共的快速崛起，使得世界各國，尤其是亞洲國家無不重新檢討與中共關係，希望能在中共經濟快速發展下獲取最大利益；當然，印尼與中共的高層互訪在 2000 年之後也更趨頻繁，尤其是元首級的訪問多有簽訂促進雙方外交發展之協議（參閱表 1-1）。

表 1-1：2001 至 2006 年中共與印尼雙方高官主要互訪

年代	記 事
2001.11	中共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尼（雙方簽署中共與印尼政府關於文化合作協定、兩國農業、旅遊以及資訊合作等多項諒解備忘錄）
2002.3	印尼總統梅嘉娃蒂（Megawati Soekarno Putri）訪問中共（印尼同時在廣州及上海設立領事館）
2002.4	印尼國會「人協」主席阿敏賴斯（Amien Rais）訪問中共
2002.5	中共外長唐家璇訪問印尼
2002.9	中共人大委員長李鵬訪問印尼
2003.4	印尼國會副議長法特瓦訪問北京會見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
2003.10	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尼峇里島，出席東亞高峰會會見印尼總統梅嘉娃蒂（中共重申支持印尼國家統一、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並促進區域合作）
2004.2	時任政治安全統籌部長之蘇希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總統訪問北京
2004.4	印尼外長哈山（Hassan Wirajuda）訪問北京（與中共外長共同主持「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首次會議）
2004.4	中共民航總局長揚元元、農業部副部長張寶文、工商管理司副局長甘國屏等訪問印尼。
2004.4	印尼海洋漁業部長羅赫敏、基礎建設部長蘇納爾塔、國營企業部長蘇卡爾迪訪問中共。
2004.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吳官正率團訪問印尼

²³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台北：唐山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301~305。

²⁴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民國 88 年）頁 388~393。

2004.11	中共國務委員唐家璇代表胡錦濤訪問印尼（會見蘇希洛總統）
2004.11	印尼貿易部長馮慧蘭（Marie Pangestu）訪問中共並參加首屆在廣西南寧舉辦的「中共－東協博覽會」
2005.4.25	胡錦濤訪問印尼，並簽署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協議。
2005.7.27	印尼蘇希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總統訪問北京，雙方簽署 5 年 140 億美元的貿易合作協議。
2006.10	印尼蘇希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總統訪問中共，參加上海「第二屆印尼與中共能源論壇」

資料來源：綜整自中共外交部出版之《中國外交》

二、印尼轉變對中共外交政策影響區域權力結構

印尼是東協的重要成員國，依照東協式的思考與安全觀，面對一個躍升中的區域強權，正面衝突與圍堵並不是最佳的安全對策，相反地，若將中共納入協商式的衝突解決架構中，才是避免東南亞陷於安全威脅的最佳策略。我國學者認為，中共一直深恐被美國及日本的聯合勢力所壓制，或是為多邊性會議的集體決議束縛，以致損害中共的利益。故中共對於領土主權爭議，尤其是與主要東南亞國家相關的南沙群島主權紛爭，一直主張進行雙邊協商解決，反對由多邊爭議國取得衝突解決之共識；而東協國家強調協調溝通與沒有強制性約束，此點化解了中共參與東協區域論壇恐被多數決出賣的疑懼。²⁵因此，可以說明印尼能夠很快地和中共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且中共亦可以透過印尼作為介入東南亞區域事務的切入點之一，未來將有可能逐漸使美、日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日益褪色。

印尼智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donesia, CSIS Indonesia）國際事務所主持人班達托（Bantarto Bandoro）研究印尼民主發展與外交政策之關係，認為印尼歷經 2004 年首次的總統人民直選，能在和平中完成選舉應是民主改革的一大進展；並引用印尼外交部長哈山（Hassan Wirayuda）在 2004 年 10 月底向媒體表示印尼的民主發展將有助於印尼的外交之說

²⁵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民國 88 年），頁 136。

法，同意印尼未來將會更融入國際社會，在區域扮演重要的角色。²⁶惟此僅係印尼官方之樂觀說法，印尼未來能否成為區域重要大國，仍需視其與美國、中共等大國關係發展而定。

東協組織（ASEAN）對印尼而言是其走出國際的重要門戶，印尼的諸多對外政策，仍需要考慮到其他東協國家的態度與立場，對此印尼智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donesia, CSIS Indonesia）副主任約瑟夫（Jusuf Wanandi）認為，包括印尼在內的東協國家與中共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以及未來在 2020 年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成立，透過彼此在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以及亞太經合會（APEC）等三個領域的更密切合作，雖有助於東亞甚至是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但在東協與中共加強合作關係的同時，仍必須接納傳統上在亞洲區域佔有優勢影響力的美、日等國。²⁷此顯示中共拉近與東協國家的距離，亟欲主導區域事務之企圖，勢將會引起國際強權之關注，對區域權力結構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

學者區鉅龍長期對印尼之觀察深入，據渠分析認為印尼總統蘇希洛於 2005 年 6 月訪問美國時，曾要求美國恢復對印尼的武器出售，惟未獲美國同意，僅恢復提供印尼軍事訓練；故在同年胡錦濤訪問印尼時，印尼與中共之同意加強軍事、經濟、文教等領域之合作，意味著中共增強其在東協國家的影響力，勢將改變東南亞的權力架構。²⁸由印尼在美國與中共間發展關係的策略運用，可以反映印尼外交獨立自主之一貫立場，並凸顯印尼亟於爭取大國的支持，強化印尼政府應付國內隨時可能發生的分離主義活動之能力。

三、印尼基於國家利益需要發展與中共關係

西方學者將東協國家與中共關係之發展粗分為兩個時期，前段是大約在 1960

²⁶ Bantarto Bandoro,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Outlook for 2005," *The Jakarta Post*, Jakarta, 30 December, 2004. http://www.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w.asp?op_id=314&id=40&tab=0

²⁷ Jusuf Wanandi, "ASEAN and China Form Strategic," *The Indonesia Quarterly*, CSIS Indonesia, Fourth Quarter 2005, pp. 328~329.

²⁸ 區鉅龍，〈印尼與美國反覆無常的外交關係〉，《印尼僑聲》100 期（台北：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民國 94 年 7 月），頁 20~21。

年代至 1970 年代，由於中共支持多個東南亞國家國內的共黨分子，故對中共普遍存有恐懼與猜忌，且非常注意區域內龐大的華人社會活動狀況；第二個時期則係自 1980 年代迄今，是在中共實施經改後，由於雙邊的經貿交流漸趨熱絡，中共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也漸趨勢微，致力於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造就後來的印尼與中共復交。但印尼軍方仍對中共保持戒心，惟因印尼沒有外患，其國防政策大部分是專注於應付危及國家統一與穩定的各項因素，故軍方對中共的可能軍事威脅已被國內安全考量所沖淡，不太會影響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²⁹此說明了印尼係基於國家經濟利益與爭取維護領土完整之國家安全之需要，改善並持續發展與中共關係。

印尼智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donesia, CSIS Indonesia) 國關組領導人艾迪 (Edy Prasetyono) 曾發表專文〈印尼國防觀察〉(Mengamati Departemen Pertahanan)，其內容談及由於印尼國土涵蓋遼闊海域，星羅棋布的島嶼難以完全進行有效聯絡，以至於中央政府對地方掌握困難，因此該國目前正面臨各種威脅，包括國內政經問題、武裝組織動亂、分離主義發展，以及恐怖主義分子活動等。³⁰該文表達出印尼國情之特殊性，其政府基於國家利益考量，外交政策必須配合維護國家安全，故向來較傾向第三世界國家之作法，採取中立態度，不參與結盟；但因印尼境內華人眾多，又掌握該國大部分的經濟利益，故對中共的關係勢將朝緊密方向發展；惟上述觀點未能在該篇論述中指出，也未對印尼國家的民族文化因素在其外交政策中之影響進行論說。

印尼國際關係學者瑪莉 (Mari Pangestu) 分析屬於國際環境的外部因素對印尼外交政策之影響，並以 2003 年為例，當時全球經濟已顯出強勢復甦景象，經濟成長率為 2.6%，中共的經濟成長約為 9.1%，超出同為東亞區域之國家許多；因此，中共經濟力量的成長確實帶動了亞洲經濟的復甦，加上大陸的廣大內需市場，皆是影響印尼重視與中共關係發展之重要因素。³¹此即顯示中共的國力已逐漸增長，並

²⁹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C.R. Neu 合著)，《東南亞在美國對中共策略中的角色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0 年 6 月)，頁 45~55。

³⁰ Edy Prasetyono, "Mengamati departemen pertahanan," *Media Indonesia*, Jakarta, 5 October 2005. (印尼文) http://www.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w.asp?op_id=391&id=35&tab=0

³¹ Mari Pangestu,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hina Factor: Implications for Indonesia," *The Indonesia Quarterly*, CSIS Indonesia, Fourth Quarter 2004, pp. 237~242.

在區域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亞洲各國皆會基於國家利益，尤其是經濟發展因素作考量，審慎處理與中共的關係；當然印尼不得不重視與中共的關係，勢將會採取較過去不同的親中共外交政策。

印尼與中共於 2005 年 4 月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代表兩國關係發展更進一步，但也會將該兩國彼此間的利益問題浮上檯面，例如對印尼深入研究的著名學者區鉅龍便曾對印尼與中共戰略夥伴關係進行分析認為，印尼各界盼望能藉此使印尼經濟復甦與穩定成長，而東協國家的看法則是因為印尼是東協大國，其舉動將牽連東南亞地區的動向。尤其是 2005 年 7 月間印尼總統蘇希洛再次訪問中共，雙方簽訂有關經貿合作等四項合作計畫與備忘錄，中共將對印尼提供援助，有利於印尼經濟發展，尤其是基礎建設；而與印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對中共而言，不論在兩國的國防科技合作，或是能源開發，均顯示印尼願意與中共展開全面合作關係，打破美國在東南亞所鼓吹的「中國威脅論」說法。³²因此，印尼與中共在增進彼此關係，皆是採取現實主義觀點，以自身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因素。

第五節 研究範圍

基於數千年來傳統敦誼外邦之對外政策思想，中共強調與鄰國和平共處，建立友好關係，尤其是萬隆會議中，周恩來曾發表和平共處五原則。³³目前因中共經濟仍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誠如鄧小平即曾提出：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方國家關係，發展問題則是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³⁴因此，中共對印尼政策應會以和平與發展原則為出發點。相對地，印尼的傳統文化融合了多民族與多元宗教，其中又以佔該國人口多數的爪哇文化與回教信仰，例如樂觀和講究互助合作的民族性對印尼與中共交往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印尼前總統蘇哈托的威權領導在 1998 年結束後，歷經哈比比（B. J. Habibie）

³² 區鉅龍，〈印尼與中國建立「戰略關係」之分析〉，《印尼僑聲》101 期（台北：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民國 94 年 9 月），頁 14~15。

³³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公司，民國 88 年），頁 388~398。

³⁴ 魯毅等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民國 88 年），頁 91~104。

總統開始民主化革新，開放黨禁，1999 年舉行首次民主改革後大選，瓦希德（Abdurraman Wahit）當選總統，嗣後瓦希德因貪污案下臺，2000 年由梅嘉娃蒂繼任總統，由於梅氏父親蘇卡諾總統過去曾與中共交密，故印尼梅嘉娃蒂政府轉變對中共態度，積極加強兩國關係。本研究即是針對 2000 年至 2005 年瓦希德總統採取開放的華人政策，有利於大幅度改善印尼與中共關係，以及梅嘉娃蒂總統執政後，印尼對中共關係由過去的反共傾向逐漸轉變至目前的戰略夥伴關係之歷程進行研究。印尼願意轉變對中政策增進與中共關係，利用中國崛起的形勢，一方面亦是基於其國家本身利益的考量；而中共積極參與亞洲事務，以國際權力平衡的作用而言，也使美、日等西方國家在亞洲之影響力遭到中共的挑戰。

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計六章，各章節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理論、文獻回顧、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章節安排等。

第二章 印尼與中共關係之回顧

中共與印尼係於 1950 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且印尼是與中共最早建交的東南亞國家；迄今該兩國間之外交關係歷經不同時期的變化，期間也在 1960 年代中期因印尼採取反共立場而斷交，最後才在 1990 年 8 月恢復兩國外交關係，目前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第三章 印尼民主化對其外交決策之意涵

種族問題一直影響了印尼政府的各項政治活動，因為政府官員多由爪哇人組成，為安撫其他較小民族的不滿情緒，重大選舉或政府在做決策時必須隨時考量到族群因素，尤其是經濟利益的分配與地方建設的均衡發展。因此，2004 年起印尼總統開始直接民選，將會使其政府更具社會代表性，以及展現民主政治的意義；而且

對印尼政府未來制訂各項對外政策時，較能以國際觀點加以了解。

第四章 印尼改善與中共關係之因素

印尼自 2000 年國會大選後，已終結蘇哈托的威權統治時代，印尼政府的對外政策將受到其國內各方政治勢力之監督，以及來自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尤其當印尼要走出亞洲，必須面對與中共交往的問題；因此，印尼為提升國際社會地位，勢將會改善與中共關係，以爭取換援。

第五章 現階段印尼與中共關係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05 年 4 月 25 日訪問印尼時，與現任印尼總統蘇希洛簽署「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此標誌著印尼與中共兩國關係發展已經進入到新的階段；不論是政治、經濟、國防、文化等領域，印尼與中共雙方均積極展開交流，同時也將會對區域的權力結構產生影響。

第六章 結論